

影 壇 憶 往 (二)

我 與 舒 繡 文

● 潘 我 源

繡 文 逝 世 放 聲 大 哭

一九六九年，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際，什麼都亂了，社會秩序亂了、人際關係亂了，總之，是一片混亂，學生不唸書了、工人不做工了，我們也無影片可譯製了，廠長和支部書記都靠邊站了，他們是走資派，都成了審查對象，另外，以各種罪名揪出來的海郊區，奉賢的五七幹校去勞動，一天，大家都在地裡幹活，一位工宣傳的師傅，拿著一疊信，分送給大家，他走到我的面前遞給我一封信說：也有你一封，我感到很意外，因為審查對象說的難聽一些就是牛鬼蛇神，雖然沒有明文規定，牛鬼蛇神不能與人通信，但一般的情況，一旦你被劃定是牛鬼蛇神，你認識的人，像躲瘟疫一樣，一下子都與你斷絕來往了。當然，許多人是迫於形勢，不能不與你劃清界線，有時候趁人不備，也會偷偷送個眼神；或者四下無人與你相遇時，講上兩句無關痛癢的話，表示他對你的友善，但是寫信的情況，還是少有，我看著信封上陌生的字跡，想不出是誰寫來的，再一看，是寄自北京東城史家胡同，啊！這不是繡文的地址嗎？我趕緊拆開信，繡文的兒子，兆元寫道：小潘阿姨，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，媽媽於本月二日在醫院病逝了……以下的字跡模糊了，眼淚奪眶而出，我也壓抑不住，放聲大哭了起來，我活兒也不幹了，肆無忌憚地坐在地上，狠狠地哭了個夠。要知道，文革中，被審查的人，是沒有大聲說話，大聲哭，笑的權力的。就是說，是屬於不准亂說亂動的人，所以，我這麼個哭法，可以說是越軌的行爲，可以受到任何人的訓斥、指責。但是，在我邊上勞動的革命群眾，甚至是工宣隊員，對我的行爲，好似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既無人來干涉，也無人來過問，說起來，人的關係很微妙，平時我就是不怕事的個性，我哭的顯然情緒有些失控，如果，他們好好詢問我，那太右傾了，如果，以訓斥的方式吆喝我，很難估計我的反應，但肯定會讓他們下不了台，所以，大家都當做沒看見、沒聽見，直到晚上休息的時候，同房間的一個姓史的女同事，她也是審查對象，問我白天爲什麼哭的那麼傷心，我說，繡文去世了。

患難之交精神支柱

記得一九五二年初，我是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演員，繡文是老演員了，我們在一個組裡，可巧，我倆的家都住在永嘉路上，那時候演員組設在張家花園，上班交通很不方便，繡文有風濕性心臟病，她每天上下班，都以三輪車代步，他那時和我並不太熟悉，但她知道我們年輕人，收入有限，沒條件天天坐三輪車上下班，他就叫我每天去她家，搭她僱的車，繡文性格豪爽、待人親切、熱情，很會為別人著想，我與她每天坐在車上，山南海北、無拘無束、隨便聊天、相互增進了瞭解、也增進了感情，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，成了莫逆之交。

五二年下半年，我調到譯製廠，她也把家搬到了高安路的集雅公寓，雖然分開了，但我們的來往一直很密切。

繡文和我認識以前，已經是全國聞名的明星了，事業上已有了相當的成就，抗戰期間，在重慶，是話劇的黃金時代，繡文與白楊、秦怡、張瑞芳，並稱為四大名旦，勝利後，又拍了不少電影，以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最為轟動，直到現在；此片還在放映，她雖成名，仍是非常敬業樂業，對工作一絲不苟，有天翻抽屜，有一付響板，我問這幹麼用，她說在「一」片中，她要跳一段西班牙舞，它就是跳舞用的，她在老師那學了回來，還天天自己練習，她就是這麼認真，她好強、對自己要求嚴格，她收入比一般人高多了，但生活樸素，從不奢侈浪費，但她並不是吝嗇，當她知道別人有困難的時候，總是伸出援手，與她一起工作過的同事，多多少少受她幫助過的人，不在少數，我就更不用說了，她待我如同親人，我的小兒子，也是繡文的兒子，也叫她媽媽，因為是繡文阻止我非法流產，她說：小潘，太危險了，你千萬別亂來，孩子生下來給我吧。她幫我準備小衣服、小被子、織小毛衣，準備了充足的嬰兒用品，孩子生下後，她並未抱走，而是每個月都給我買奶粉的錢，直到週歲孩子斷了奶。她說要孩子，是讓我安心，替我解除經濟和精神上的負擔，我對她的感激之情，已不是謝謝這兩個字可以表達的了。

童年貧寒生活悲苦

由於和繡文的關係親近，她要我幫她寫自傳，事隔多年，許多事我已忘了，我只記得她小時候，家境貧寒，父親教書，母親是家庭婦女，父親不太顧家，母親脾氣不好，時常拿孩子們出氣，她從小就出來做事、賺點錢，補貼家用，她還教過演員陳玉梅的國語，後來進電影界也是這層關係，總之，她童年的生活是悲苦的，大約在她十六、七歲的時候，生過一個男孩，由於是未婚生子，孩子被送走了，從此沒有了音訊，她提起這件事還感到心酸，她說：我的孩子如果還活著，現在該有有廿多歲了，做為母親沒有能抱抱、親親自己的孩子，成為她終身的遺憾，她把所有的母愛都給了現在的兒子，雖然這孩子不是她的親生，但她視如己出。

一九五四年的時候，繡文認識了一位名中醫，四川人，叫周潛川，周醫生悉心為繡文醫治，為她調理，周醫生的醫術確實高明，繡文的體質明顯地大有好轉，本來，她連路都走不動，每一步都是緩慢地向前移動，但在周醫生為她治療了一個階段後，她的行動能像正常人一樣了，五五年，她居然能隨電影代表團，去德國訪問，在她去德國期間，他父親因肺癌去世了，她的丈夫吳紹煒，非常焦急，來找了我兩三趟，他說：小潘，你知不知道，繡文媽媽去世的時候，繡文哭得死去活來，往媽媽棺材裡撲，拉都拉不住她，她和

媽媽關係不是很好，會哭成這樣？她和爸爸很好，如果知道爸爸走了，還不知會哭成什麼樣呢！你和她的好朋友，她快回來了，你一定要在我家，幫著我看怎麼告訴她，繡文回國那天，我先到她家去等她安定下來以後，我說：繡文，告訴你件事，爸爸死了。繡文異常冷靜地啊了一聲，短暫的沉默以後，我說：紹煒怕你難過，幾次去找我，叫我來陪陪你，他說：媽媽去世的時候，你哭的死去活來，這回爸爸去了，還不知道你會怎麼樣呢。繡文說了一番話，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，她說：過去媽媽脾氣不好，老罵我們，我不喜歡她，甚至還有些恨她，可是後來我能理解媽媽的心情，因為孩子多，生活擔子重，爸爸不顧家，媽媽壓力更大，當然脾氣不好，再說，等到我生活好了，可以讓媽媽過好日子了，她卻積勞成疾，沒能享到我的福就走了，想到媽媽悲慘的一生，怎不叫我傷心欲絕，可是爸爸，這一輩子沒受什麼罪，他年輕時，自己吃喝玩樂不顧家，媽媽和我們受苦，他也不管，而且，他跟著我享了許多年的福了，我對他不感到虧欠，而且他又很長壽，所以他的走，我沒那麼難過。

卯足全力演活虎妞

有一回繡文問我：小潘，你有沒有真正愛過一個人？沒等我回答，她又接著說：「我這輩子真正愛過一個人，我認識他的時候，我們都已結婚了，所以我們不能結合，以後也沒有可能，但是我是多麼愛他啊，可以說是愛到刻骨銘心，我問問是誰？我認識他嗎？她說：你不認識，他在北京工作，但是他知道你，我給他的信裡提到過你。」

一九五六年，繡文決定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去工作，她說話劇比較穩定，對她身體有利，我說：你走了，紹煒怎麼辦？兆元怎麼辦？其實舞台也不適合你，演話劇也很累的，你為什麼要把個家分開兩頭呢？繡文說：這話我只能對你說，我考慮了很久了，紹煒對我太好了，他的父母也對我很好，但是，你知道嗎，紹煒是獨子，他的父母很想有個孫子，我不能再拖下去了，我到了北京後，慢慢提出和他離開，讓他有機會再結婚生子。否則，我覺得太對不起他，孩子我帶走，因為我不會生，去到北京，我也可以到我愛的人身邊，他能常常來看看我，就夠了。我雖然捨不得她離開，但又能說什麼呢，繡文的安排是經過深思熟慮的，她離開紹煒，是希望紹煒能有自己的子女，不要使兩老失望，後來紹煒又結婚了，並生有一個女兒。

繡文走前，說要拍照留念，就帶著兆元和我一起去照像館，我們這張合照，我保存了四十年了，繡文去了北京以後，我們經常通信，那些信，在文革中全消毀了，沒有留下只字片語。

繡文在北京人藝，演出了話劇「駱駝祥子」，她飾演的虎妞，好評如潮，在她的來信中，我看出她的興奮與欣喜，去北京看過她的戲的朋友，回來對我說，繡文簡直把虎妞演活了，這角色，除了她，不作第二人想，好久沒看過這麼過癮的戲了。我問，看得出她有病嗎？回答我是，一點看不出她是病人，生龍活虎，精氣神足著呢！我為繡文再一次的成就感到高興，但更多的是擔心，因為別人做的好，是用心去做的，而繡文卻是用命去做的，她好強、好勝、不會因身體不好而姑息自己，也不會降低要求，她會卯足全力去衝刺、強打精神，拿出最好的成績，展示在觀眾面前，這個戲演完以後，她又病倒了，許久不能工作，一直臥病在家。

在北京找到了幸福

六〇年，她來信，希望我去北京看望她，並寄來了路費，我請准了一個星期的假，到了北京，我到東城史家胡同，那是劇院分給她的一套房子，兩人相見，有說不完的話，那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，我說我餓死了，特別想吃油炸花生米，要知道花生米在當時可是精貴得很，誇張點說簡直就是金豆，第二天，早上起來到廚房，繡文說：你想吃的花生米，我已經炸好了，稀飯也熬好了，快吃吧。她坐在邊上微笑地看著我，我不僅享受了一頓豐盛的早餐，而且還感到十分的溫馨。

讓繡文深愛著的那個人，過去我知道他，他也知道我，現在知道我來到北京，特地來看我了，雖然以前我們沒見過面，但是我並不感到陌生，他是一位學者，高高的身材、溫文儒雅，很有長者的風範，對我十分地親切。他說：小潘，難得來趟北京，走，到全聚德吃烤鴨去吧，又帶我去遊頤和園，短短幾天的相處，我相信繡文找到了她想找到的幸福，我放心了，一個星期匆匆而過，我又回到了上海。

在繡文的來信中，知道她的病越發嚴重，出現了水鼓，她聽說上海仁濟醫院，有個鄭醫生，治療心臟病很有經驗，我就為她去找到鄭醫生，鄭醫生同意為她診治，繡文就來到上海，這大約是六四年的時候，她須要先消除水鼓，才能動手術，於是又轉到華東醫院，醫療、休養了半年多，再去仁濟醫院，由鄭醫生為她作了手術，手術後，又用了半年的時間休養，前後一年多的時間，她才回到北京，不幸的是，她回到北京後不久，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。

上海一別竟成永訣

一九六七年一月，我們譯影廠的造反隊到北京串連，我也是造反隊員，下了火車，我就把廿幾人的隊伍帶到了繡文家，因為到北京是晚上，人生地不熟，我想繡文家有四房一廳還挺大，我們先去落落腳吧，沒想到她的房子被北京入藝的造反隊封了好幾間，我們大家只好擠在一間屋子裡，坐了一夜，第二天，我們又到文化部找地方住，沒想到，文化部又髒、又亂、滿地的稻草，到處住的是人，連樓梯拐角的地方也睡人，臭氣沖天，我們趕快離開，最後，只好到北京電影學院去落腳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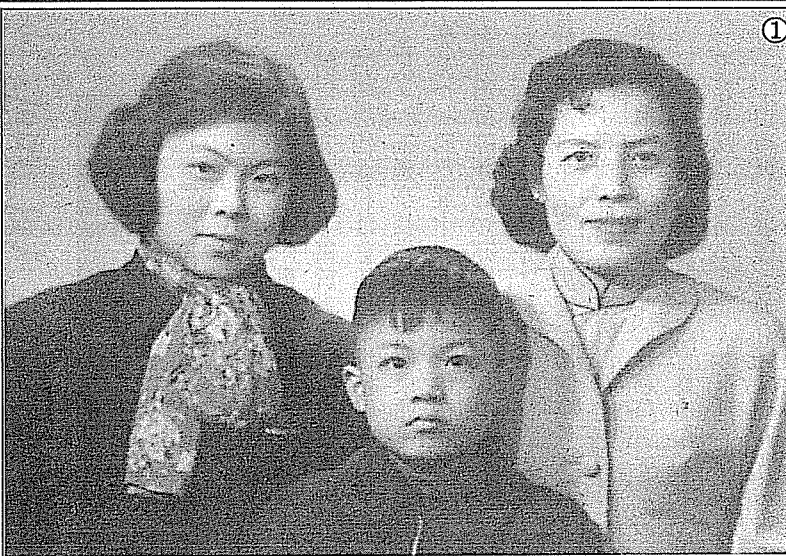
在北京電影學院呆了些日子，亂哄哄地，什麼也做不成，不知道幹麼去了，就是一陣串連風給刮到北京去了，無所事事，又回上海。一路上被串連的人攔車，火車是開開停停，一停就是幾個鐘頭，從北京到上海，走了四天三夜，又沒吃的，車子又擠，一個臥鋪上坐四、五個人，走道上站滿了人，擠的不能動彈，我坐在車門口，又冷又餓，我餓的直反胃，連胃液都吐出來了，到了上海已精疲力盡，像生了場大病。

六七年二月份，繡文突然到上海來，她住在我家，她是逃避他們單位的造反派，躲到我這兒來了，可是，全國一樣亂，文藝界也是一樣亂，上影廠的造反派也會來沖擊夏天，他們來了看到繡文，也不會放過她，所以我讓繡文找一個不是文藝界的朋友，到她家去躲躲，避避鋒頭，繡文走了的第二天晚上，上影廠一卡車拿著大棒子的紅衛兵，開到我家來了，準備打、砸一番，那天也巧，我的衣服掛在椅背上，袖子上別有「上海文藝界造反司令部」的紅袖章。他們氣勢汹汹地推門進來，一眼就看到紅袖章，有些意外，怔了一下，問是誰的？我說是我的，一聽是同一個司令部的，態度緩和多了，向我表明他們是來造夏天的反的，要和我談談，我當然表示同意和支持他們，他們就說，那好吧，由你來教育夏天吧，他們就開車走了，我們家也就躲過一劫。

繡文在上海期間，晚上有時偷偷地到我家來，每次來她都很害怕碰上造反派，我家不能住，她在上海也就無容身之地了，她只能再回到北京，那一別，我與她竟成永訣。

她手術後，還未養好身體，就遇上文革，幾經折騰與驚嚇，她的病又復發了，又住進了醫院，這次住院不僅無人去探望她，而且醫院也沒有人為她悉心醫治，她的鼓脹不是水鼓，而是血鼓了，因為鼓脹的太嚴重，她整夜整夜不能睡覺，只能坐著，她根本無法躺下去，她是坐在那裡去世的，繡文的結局是悲慘的、淒涼的，她孤獨寂寞地走了，沒有人送她，沒有花圈、沒有眼淚，像我這樣敢為她放聲痛哭的朋友，是絕無僅有的。

事隔十幾年，我已移居香港，才收到「舒繡文追悼會」的通知，公開為她平反，可這些對繡文還有什麼意義？我看著追悼會的通知，感慨萬千，長嘆一聲，繡文，你是死不逢時啊！



①左起：作者潘我源、舒繡文之子舒兆元，舒繡文合影。
 ②作者潘我源（二排左一）與二排左二起，舒繡文、路明、殷子，前排左起：柏李、王靜安、汪漪等人合影，後立者為莎莉。

